

企业呼吁重拾押金返还制 弥补资源回收短板

■ 本报记者 刘季辰

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解决资源回收的问题,目前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领域,已经涌现一批成熟的企业和商业模式。与此同时,大型品牌厂商也通过自建回收,践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像旧衣物回收、手机回收等中高值回收也涌现了一大批O2O企业。但是像饮料瓶这样最常见且对环境构成污染的小件,虽然有盈创这样的企业在关注,但从盈利、运行方式等方面,依然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押金返还制度的魅力

早年《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德国曾被超市里硕大的红色饮料瓶回收机所吸引,原来“卖废品”可以这么高端。在法兰克福的家庭,记者观察到,他们把家里的饮料瓶收集到一定数量后,在购物的途中顺便扔进回收机,并获得几个钢镚,作为报酬。如今可喜的是,这种回收机在北京等城市的地铁、度假村、酒店中也越来越多,但是使用率并没有德国那么高。

不仅是回收机,就连北京街头巷尾的回收车,也是门庭冷落,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涛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谈道,德国人之所以是主动而为之,是因为他们购买的饮料中,无论塑料还是玻璃,价格中已经包含了瓶子的押金,有些地区还

特意在货架上标注原价,小票中显示加价,来提醒消费者“多出来的钱是可以退的”,这就是押金返还制度的魅力。

事实上,早年间,中国的啤酒瓶、酸奶瓶回收就是采用这种制度,买饮料的同时,售货员会给一张小卡片,上面的金额,在退还瓶子时同步返还。可如今为何不见踪影了呢?常涛告诉记者:“押金体系具有灵活性。由于监管机构具备立法、与业界合作以及沟通对话层面上的优势,对拟建立体系的有效性和效率将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见这种制度完全靠市场运作,间断性难以避免。”

那么这种制度建设,应该如何展开呢?常涛介绍说,押金返还制度要依据9个关键参数,分别是立

法范围、财务分析、目标和惩罚规则、手续费、押金值、组织机构、包装物类型的覆盖范围、物流、返还点。它们需要根据当地需求、立法情况、回收利用目标、人口统计资料、产业结构和现有的协定等来拟定适合本地的体系。

企业呼吁 加强顶层设计

目前,全球已有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成员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确立了环境押金返还制度的法律地位。但大多集中在欧洲国家,其中德国的回收及覆盖率达到98.5%(饮料瓶/易拉罐、玻璃瓶)。常涛表示:“押金体系的实施,实现了金属和PET

饮料包装物的高回收率(规模化),并提高了一次性饮料包装物的使用生命周期,及对环境的直观保护,使得城市‘乱丢废物’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此外,押金制度对于消费者和贸易行为而言更加容易并且有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充分再利用。”

常涛希望政府部门能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须建立起宏观监督机制,对环境押金返还制度实施进行总体指引和监督,规范行业制度。另一方面,在企业层面,强化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回收本企业废旧产品的全程义务,考虑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责任延伸制度,明确生产商、销售商、消费者对废弃物回收、处理和再利用的权利与义务。

在《中国企业报》记者对多位专家的采访中,专家们普遍提到了“拾荒者对城市资源回收的贡献”,但同时也表示担忧,因为废弃物是被收走了,但是由于受到正规回收网络体系尚未构建、标准化回收器具明显不足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支撑薄弱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塑料饮料瓶进入到了非正规拆解的“家庭式小粉碎作坊”。

“小粉碎作坊”无需支付预防环境污染的费用,价格优势使得其严重挤占了正规处理企业的原料来源,且经过粗放的造粒加工,会对地下水源、土壤及公共卫生安全等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原本达到可饮用级的包装物只能达到低值次级利用的水平。

我国自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包装资源回收利用暂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9条规定,凡应回收的包装资源,各商品经营单位在出售商品时,可采用收取押金的方式,保障如数回收。但后来《办法》因故废止。

常涛说:“这是一件令绝大多数学者遗憾的事情,如今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环境监管和治理,此时押金返还制度应顺势受到政府、学者、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和赞誉,并借助现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换平台,‘制度+智能环保设备+物联网’定能引发消费者在资源分类回收的兴趣和主动性,这对于反向物流体系的建设将起到重要作用,并带动新兴环保企业的崛起,弥补再生资源领域的空缺。”

借力生态文明软实力 打出漂亮经济牌

生态文明建设其实就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为后人“乘凉”而“种树”,就是不给后人留下遗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

把生态文明软实力 变成绿色发展硬支撑

云南是一块对国家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绿色高地。普洱是这块高地上的点睛之笔。普洱生态良好,全市森林覆盖率接近70%,有自然保护区16个、占国土面积比例达20%,保存着全国近1/3的物种。如此良好的生态,如果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和行动,难免会遭到破坏。而普洱很早就将生态文明建设中将政府主导与群众自觉有机统一,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实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循环的生态文明工程,把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构筑成为普洱发展的硬支撑。

近年来,普洱市强化资源生态环境监管,加强污染防治,实施

了原始生态和湿地恢复、农村环境整治和坡耕地生态整治等工程,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累计建成16个自然保护区、6个省级风景名胜区、1个国家森林公园和1个省级森林公园,完成了140万亩生态茶园改造,占现代茶园面积的96%,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强化。依托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2013年6月,普洱市获批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作为全国首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普洱市生态文明建设有了绿色产业的支撑。目前,普洱市已初步形成特色生物产业、林产业、水电、旅游度假四大产业集群。

生态文明的典型样本

安吉,曾是浙江省最贫困的山区县,为了“脱贫”,也曾走过一条财政上去了、环境变差了的弯路。为了探寻经济发展与生态优化共赢,安吉确定“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治污与建设美丽乡村协同推进。虽然也付出了沉重的

经济代价,但终于迎来了一个经济结构合理、社会和谐稳定、人居环境优美的新安吉。

保护生态,就必须向污染企业宣战。县委、县政府毅然关闭了33家污染企业,包括占全县1/3税源的孝丰造纸厂制浆生产线。开山挖矿,投资少来钱快,一直是县里的支柱产业。治污的第二刀毫不犹豫刺向了矿山企业,243家矿山企业只剩下达标的17家。

关、停的同时,安吉还扎紧了口袋——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一律不准落户。印尼金光集团一个投资近50亿元的造纸项目,投产后年税收可达10亿元,然而因为环保问题被淘汰了……近3年,170多个5000万元以上的投资项目因环保评估不达标被否决,其中超亿元的项目就有10多个。

在治污的同时,从2003年开始,安吉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开展村庄环境综合整治,该县首创的“五整治一提高”工程成为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模板。

单从经济指标考量,“生态立

县”付出的代价的确是沉重的:在湖州各县市的经济排序中,安吉一度倒退至倒数第一。如今,“山峦青翠、河流清澈、空气清新,经济结构合理、社会和谐稳定、人居环境优美。”这是国家环保部门对获得“国家生态县”称号的安吉所做的评价。

守住绿水青山 收获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已成为城市理想和价值追求。珠海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家园更美丽,成为珠三角地区环境质量最好、土地开发强度最小、人口密度最合适、低端产业布局最少及社会最和谐、最平安的城市之一。

一系列漂亮的环保数据直观地显示了珠海生态文明的“硬指标”:2015年全年空气质量达标率为90.0%,全市各主要河流、饮用水源地水质、近岸海域水质保持100%稳定达标,各项污染物监测

指标年均浓度全面达标,区域环境噪声值符合国家标准。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5.9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9.5平方米,万元GDP单位能耗0.399吨标煤,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万元GDP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强度分别为1.98千克、1.61千克以内,较2009年下降42.4%、39.5%。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成为广东省增幅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是珠海生态文明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红利”缩影。守得住绿水青山就一定收获金山银山。30多年来,珠海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坚决关闭一批污染型、高能耗企业,引导企业加大技改和研发力度,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如今,生态文明作为珠海的城市理想和价值追求,不仅源源不断为城市发展注入“绿色动力”,更为珠海经济发展“攒足”后劲,赢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来源:《中国循环经济》)